

红色收藏



“西北农民银行吉县支行”印章(山西省档案馆藏)



面值“壹圆”的西农币(山西省档案馆藏)

山西省档案馆的特藏库里珍藏着一份实物档案,看上去,这似乎只是几块不起眼的小木头,但它所镌刻的却是抗日根据地的红色金融事业,从筚路蓝缕、艰苦创业到不断发展壮大的光辉历程。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八路军120师主力挺进晋西北,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根据地要生存发展,离不开经济建设。而当时的晋西北地区地瘠民贫,再加上日寇的侵略和掠夺,更是雪上加霜。为解决这一问题,给根据地的发展筹措资金,党组织决定:在晋西北首先创办一家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银行。而筹建和管理银行的重任,就落到了著名爱国士绅、中共秘密党员刘少白的身上。

刘少白,名象庚,字少白,1883年6月出生山西省兴县黑峪口村。刘家在当地是当地首富,因而刘少白从小受到了良好教育,清末曾参加科举被选为贡生,之后响应辛亥革命,出任山西省首届议员,在当地有很高声望。刘少白追求真理、思想进步,曾冒险营救过许多中共党员。1929年至1931年间,刘少白在北京租下纪晓岚故居作为寓所,而这座“刘公馆”也成为了我党的地下联络站。1937年8月,经中共中央北方局同意,由王若飞和安子文介绍,刘少白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临危受命的刘少白,拿出自己全部积蓄,又动员当地的进步士绅、富户捐款捐物。很快凑齐了开办银行所需的股金。对于这家银行的名称,有人提议叫“兴县银行”,也有人说这叫“抗日银行”,而刘少白则主张叫“兴县农民银行”。这样一方面既可以避免阎锡山政权官办银行的抵触排斥,

另一方面,也会使广大农民感到亲切,更贴近百姓。1937年11月,兴县农民银行正式成立。首要工作是发行钞票,由于当时纸张和印刷材料奇缺,大家千方百计克服困难,没有印钞纸,就用农村的土制纸替代,票面也是由刘少白带领一些同志自己研究设计的。为防止伪造,他还在票面上设计了多处暗记,类似于今天钞票上的防伪标记。根据档案资料证实:这是“七七事变”后抗日根据地银行最早发行的一组纸币。由于面额小、发行数量适当,“兴农币”币值稳定,深受当地老百姓的欢迎。

兴县农民银行的成立,对于解决八路军军需、发展根据地经济、提高根据地人民生活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后来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兴县农民银行在1940年又扩建成立西北农民银行,刘少白继续担任行长。西北农民银行发行了新的“西农币”,这中间还有一段小插曲:第一批印制的“西农币”,票面上的“西北农民银行”错印成了“晋西北农民银行”。刘少白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用毛笔蘸上墨汁把“晋”字一个一个地涂掉。

西北农民银行克服了种种困难,不断发展壮大,在晋西北地区开设了多家分行、支行,山西省档案馆藏的很多印章,就是当时西北农民银行各家分行所使用的。1942年5月,刘少白、牛友兰率晋西北进步士绅参观团赴延安访问,受到毛泽东、朱德等党和八路军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毛泽东还曾在文章中盛赞刘少白“在抗日战争和抗日斗争以后的困难时期内,曾经给我们以相当的帮助。”

1948年1月,陕甘宁边区银行并入西北农民银行,此时的西北农民银行已成为真正意义上西北地区的银行,“西农币”也成为整个西北解放区的本位币。

1948年底,西北农民银行和华北银行、北海银行合并为中国人民银行。至此,历经风雨的西北农民银行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化作厚重的基石,承托起新中国金融事业的壮阔恢弘。

艰苦奋斗 发展红色金融

柳杨

元代木作精品八卦藻井

闻午



窦大夫祠内八卦藻井(太原市文物局供图)

窦大夫祠文物景区由窦大夫祠、保宁寺、观音殿、赵戴文公馆和烈石寒泉组成,占地1.7万平方米,时间跨度从元朝延续到上世纪初,2001年6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存的窦大夫祠是元代建筑,而献殿中的藻井便是最具特色的部分。

窦大夫是春秋时期人物,姓窦名犇,字鸣犇,由于当时官拜大夫,所以纪念他的祠堂叫作窦大夫祠。窦大夫祠

原址不详,时间也没有准确记载,有明确记载的是在宋代元丰八年(1085)旧祠被上涨的汾河水冲毁之后,于元代在现址上对祠堂进行了重建。

窦大夫祠作为一座祠堂,最重要的功能便是祭祀。献殿就是祠堂内部举行祭祀的场所,时人会在其中举行祈雨仪式。献殿四角立柱,造型巍峨壮观,屋顶为单檐歇山顶,琉璃剪边,檐下斗拱五铺作双下昂计心造,飞檐翘角,犹如大鹏展翅。面阔、进深各一间,正方形,是一座开放式的祭祀场所。每逢久旱无雨,历代守臣及周围百姓都在窦大夫祠祈雨、摆放贡品,且多有应验。现存于祠堂内可以看到的很多石碑,均为历代祈雨之后心愿得显后天降甘霖的记录。也正因此,宋徽宗将窦犇追封为“英济侯”,“英济之名,盖取其生而英灵死而万物故也”,说的就是宋徽宗认为窦犇在世期间庇佑一方,去世后依然逢祈必应,降雨济泽一方。

站在献殿中心抬头向上看,映入眼帘的就是献殿中最为精华,也是整个窦大夫祠内最具特色的部分——藻井。

藻井是以形得名。汉代张衡《西京赋》有一句“蒂倒茄于藻井”,意思是藕倒栽在藻井,荷叶荷花向下反披。古人在殿堂、阁楼天花上作井状装饰,同时饰以荷、菱、莲等水生植物。就是希望能以水克火,保佑建筑免遭火灾之厄。站在装有藻井的献殿内仰望,就像站在井底仰望所能见到的一样,有井壁、井口。古代匠人极尽精巧之能事,常在其中最显眼的部位描绘图案或雕刻花纹,营造出了藻井这种天花板上的绝美艺术。

窦大夫祠中的藻井又称八卦藻井。藻井均以斗拱递叠而就,一、二层为四边形,二层以上为八边形,最顶上为圆形,上圆下方,暗合古人“天圆地方”的世界观。并于二

层各边设神龛四座,构造疏朗,玲珑别致,其中构造由木条交错层叠咬合构成八卦,再而重叠渐进,演变成八八六十四卦,构成《周易》八卦藻井的整体。

历朝历代对祠堂修缮后会留下记录。藻井内部有一根立柱,上书“大清同治二年三月修理”,便是清代匠人对藻井进行落架大修的记录。所谓落架大修,指的是当建筑构架中主要承重构件残损,有待彻底修整或更换时,先将建筑构架全部或局部拆落,修配后再按原状安装的维修方法。这种修缮方法很好地维持了藻井原本的样貌,并且延长了献殿的使用年限,使我们直到现在依然得以欣赏到当时建筑的精巧结构与高超工艺。值得一提的是,落架大修是只适用于木结构式的建筑,对于砖石结构的建筑并不适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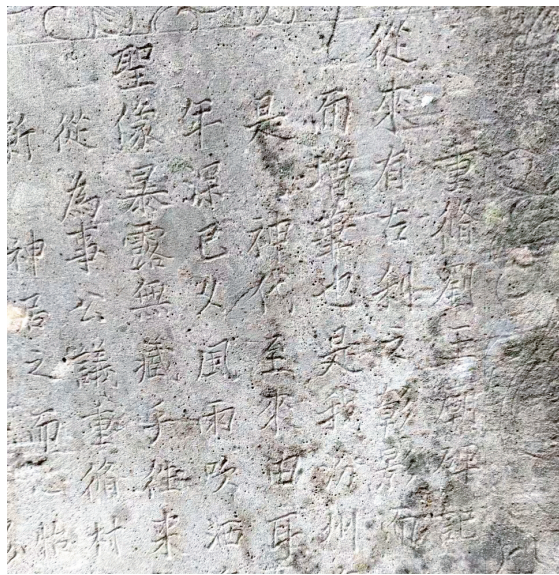
窦大夫祠内八卦藻井,斗拱排列疏朗有序,结构简练而严谨,造型精巧而华美,是元代木作不可多得的精品。



太原市文物局 太原日报社 联办

文水再现刘王庙

刘勇



刘王庙碑部分铭文(作者供图)

苔藓的圆首石碑,碑面朝东。近前拂去碑面灰尘,识读碑文,正是刘王庙碑。目前可见碑高约120厘米,嵌土碎石尚多,估计底座还在下面,待清理。碑身厚约12厘米,宽约56厘米。地表可见尺寸较大的砖瓦残件,初步判断可能为明代构件。

逐渐清理积土,发现碑文还可大体识读。碑首竖书“善成福至”。正面碑文为《重修刘王庙碑记》。正文后上排、中排、下排、碑阴均为功德主题名。

由碑文可知,此碑为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立,碑北边的条石围砌的小石屋遗址,应即为刘王庙原址,就其条石风化程度来看,较稳妥多有苔藓覆盖的条石墙体要晚。碑文中的黄崖底村应即为现在的下庄村,而这处黄色岩石形成的山体绝壁应为黄崖底之名的来历。碑文载“自纪之正统年”,或是清嘉庆年间立碑时,尚存明正统年间的碑刻。

碑文虽未提及刘王是哪位历史人物,但结合这一带的刘王庙有关遗存的情况看,这座下庄东部山崖是一处明显的制高点,在此建堡具有明确的军事目的。目前已知的刘王庙也多在相似的高点位置。

绝壁西侧河谷对面的山体,当地人称刘王坡。时代久远,村民在清代重修时已难以说明刘王来历,但刘王崇拜历代传承有序。

本次发现的下庄刘王庙,应同刘王庙碑一道重建于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这一带的刘渊神庙还有刘家崞村刘王庙、刘渊山上的神庙(已不存)、陈家塔和上四皓村的刘渊行宫等。

吕梁深处的三道川曾是南匈奴部众长期生活、居住的地方,刘王信仰,千年不坠。自刘渊山至三道川谷地也是刘渊祭祀地的密集分布区,这与匈奴后裔族群的分布和活动是密切相关的。

《晋书》卷97《北狄匈奴传》、《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资治通鉴》卷67《汉献帝建安二十一年(216)》等文献记载,东汉末年曹操将南匈奴单于呼厨泉置于郿城,将南匈奴部众分为五部居于汾河流域,其中的中部驻在大陵(大陵故城遗址范围在今文水县和交城县交界处)有6000落,如按照一落5人计算,这部分中部南匈奴部众即有3万人左右。在当时人口超过一万的县即为大县。南匈奴中部居于大陵的时间如按照自东汉末年建安二十一年(216)至西晋永安元年(304)刘渊起兵时计算,至少有88年之久。刘渊起兵后,一部分匈奴人随其作战,一部分匈奴人可能仍在山区游牧。三道川以北山区连接吕梁山核心区,与南云顶山、骨脊山、孝文峰、北武当山等连成一片,这里与位于方山左城城南的南匈奴王庭亦不远,部分匈奴后裔留居此处山区是自然之事。

由此,下庄刘王庙遗址可以认为是这一带南匈奴系胡族后裔祭祀祖先刘渊的场所。

母子丁天鼈解

如黛



母子丁天鼈解(山西青铜博物馆藏)

山西青铜文化历史悠久、序列完整、种类齐全、风格独特、精品众多。收藏于山西青铜博物馆的母子丁天鼈解是一件商代的青铜珍品。

这件母子丁天鼈解历经3000多年,部分表面已氧化形成绿色锈斑。该器通高约15厘米,椭圆形,分盖和身两部分。盖向上隆起,呈椭圆冠状,顶设菌形钮。盖面饰两个对称的浮雕兽面纹:巨字眼,眼珠凸出;平直眉,眉梢内钩;大张口,獠牙毕露;扁鼻头,鼻梁向上。鼻梁上还有两组弯钩形纹,似乎神兽正在呼呼吐气。颈部与圈足部饰对称的夔龙纹,直身,卷尾,另饰几道弦纹。腹部饰两个对称的浮雕兽面纹,与盖面的图案大致相同,相互呼应。该器的兽面纹没有兽角,也没有底纹,因此推测其时间

应为商代中期。因为商代早期的兽面纹之要简单一些,而晚期的兽角和底纹都很繁复。器内和盖内有铭文:“女(母)子丁天鼈。”

解是古代中国用于盛酒或饮酒的器物。大多以青铜铸造而成,器形似尊,但比尊小,是一种盛行于商代晚期和西周初期的小型饮酒器,侈口,束颈,圆腹,圈足,大多数有盖,便于密封。

解有两类,一类是扁体的,一类是圆体的。这两类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皆有,后者且沿用至东周。《礼记·礼器》中记载“尊者举解,卑者举角”,郑玄注称“凡饮酒时,三升曰解”。可见,小小的解反映出古代等级制度和人的尊卑身份,凡能用解者必为贵族。

古建中的防火智慧

钧希

中国的古建筑以木架结构为主,砖石结构为辅,虽然具有良好的抗压、抗弯、抗震等特性,且重量轻、易于加工,但是木质的易燃性却增加了防火的压力。因此,古建筑的防火成为古人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

古人信奉神明,因此会在建筑物上放置厌胜之物,祈求神明保佑建筑不受火灾的侵害,大同华严寺大雄宝殿、芮城永乐宫三清殿的屋脊两端都有一组对称的龙形装饰,在建筑学上称为“正吻”或“大吻”。这实际上是一种叫“鸱吻”的神兽,古人相信这种神兽可以辟火。宋《营造法式》引《汉纪》曰:“柏梁殿灾,越巫言海中有鱼虬,尾似鸱,激浪即降雨。遂作其象于屋,以厌火灾。”

虽然建造了“藻井”“鸱吻”这类具有祈愿性质的辟火饰物,但拥有实质性的消防工具才是更为重要的。在山西的很多古建筑院内中心,都摆放着一口大水缸,被称为太平缸,不仅有聚财纳福之意,在火灾初起阶段更有灭火之用。

而一旦火灾蔓延,就需要专门的“消防员”去处理了。收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东井灭火”陶井,是一件东汉时期的明器。该器平面呈长方形立框,犹如“井”字状,上下相通。前壁图案有一名灭火者徒步疾行,左手执水罐,右手荷旗,旗帜上清楚地标有“灭火”字样。在图案的左右两侧还有四个篆书文字“东井灭火”。陶井上的四字铭文以往一直被读作“东井灭火”,后经学者考证定为“灭火”,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内涵却大不相同。“灭火”是火灾发生后的行为,而“灭火”是提醒人们慎于用火,古人“防患于未然”的智慧得以显现。据推断,这位肩扛“灭火”旗帜的男子很可能就是当时的“专职消防员”。

不得不说,古人的消防智慧,时至今日仍可借鉴。



大同华严寺大雄宝殿鸱吻

“东井灭火”陶井(辽宁省博物馆藏)

晋中王家大院内的太平缸